

第一部

创 世

关龙曼^①：“噢，爸爸！”

乘泛美航空公司的中国快班从好莱坞到中国的航程很长很长。在日本人轰炸珍珠港之前，我没有乘这个航班回中国去打日本人。我的公关人员在好莱坞放出风说，我即将搭乘这个航班回中国，参加中国空军，为中国而战，抗击日本侵略者。根本没有这回事。但人们喜欢把我想像为一个民族英雄。大家都认为我们的民族需要英雄。

乘联合航空公司的航班从好莱坞到火奴鲁鲁的航程已经够长的了，况且我还要赶另外一个航班到另一个岛上去为《夏威夷州警》拍外景。据传言，一部新的陈查理电影即将开拍，国家广播公司的副总裁大卫·特贝特正在满世界寻找英语说得溜、美国观众

关于译文中华人和华裔姓名的中译，有较为固定译法的则遵循旧例，如小说中的陈查理 (Charlie Chan) 和傅满洲 (Fu Manchu)。已知其中文姓名的历史人物用其中文姓名，如黄宗霭 (James Wong Howe) 和黄柳霭 (Anna May Wong)。但是，为了行文方便，有的历史人物的姓名则用音译，译成西式姓名，如文中扮演陈查理儿子的华人演员凯·卢克 (Keye Luke)，他的中文名字实际上叫陆锡麒。至于小说中虚构人物姓名的译法，华人移民和生长在唐人街的老一辈华裔人物的姓名采用意译法，译成中式姓名，与主人公尤利西斯同辈的新一代华裔美国人的名字则采用音译，译成西式名字。译者之所以采用不同译法，主要原因是，区分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并界定华裔美国人的特性是华裔美国文学的主要关怀（参见赵健秀选编的《唉，啾！》的导论）。译者对华人和华裔的姓名作不同处理，力图体现中国文化和华裔美国文化的差异，使译文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更忠实于原文的文化取向。

《夏威夷州警》(Hawaii Five-O) 美国电视连续剧，从 1968 年首播，直至 1980 年才结束，据称是美国最长的警匪片。

能够听得懂的华人演员出演华人侦探陈查理，陈查理的角色将第一次由华人出演，这件事传的沸沸扬扬。陈查理的四个儿子，凯·卢克·本森·方·维克多·森·杨 还有我 我们都感觉到了我们所拍过的电影的魔力，兴奋不已。我们在电话机旁摆出漫不经心的姿势 等着电话铃响 说不定上帝正拿着照相机挨门串户呢。

我来看我电影中的父亲安劳夫·洛伦，他在电影中演陈查理，我演陈查理的四儿子。二十年前 我们是赚钱的老明星 不过我一直看相年轻 拍起照片来也显得很年轻 看上去要比我的实际年龄小得多。现在 我们这些老一辈更老了。他年纪太大 已不能再演新的陈查理了；也许他看上去更像陈查理，但他不想演了。我搞不懂。

我看上去还不太老。在陈查理的四个儿子中，我看上去仍是最年轻的 我想成为银幕上演陈查理的第一个华人。凯看相老 扮相也老 他越老越像老外。不是华人的那种老外相 而是带有点欧洲老外相，说话带有假英国口音。本森已是老朽。维克多相貌太差 演不了陈查理。能够在好莱坞电影中接过爸爸这个角色的 我是四个儿子中的惟一人选。我的时机就要到了。无论是大银幕还是小屏幕 我要做第一。

我在火奴鲁鲁的大雨中降落在岛上，雨点大如鸡蛋，铺天盖地。空气中水气特别浓，联合航空公司的航班似乎带着我降落到了海底 我呼吸着湿漉漉、黏糊糊的空气 搞不清身上的泥浆是天上降下来的还是地上溅上去的。耳边的雨声和泥巴打在身上的声音响成一片。雨水把汗水和头发冲进眼里，我只能模模糊糊地辨出灰一块、蓝一块、绿一块、红一块。我分不清哪里是飞机、哪里是机场 分不清什么是雨水、什么是玻璃和钢铁。在浑然一片的迷茫中 五块影子凸现出来 臧着我的名字 我隐约看见了他们穿的夏

夏威夷衬衫。

一个浑身湿透的夏威夷女孩，褐色皮肤，穿着塑胶夏威夷短裙，微笑着像是在做牙膏广告。她把一个湿淋淋的花环套在我的脖子上，立刻使我鼻涕直流。她把又湿又黏的嘴唇印在我又湿又黏的脸上，接着就消失了。模模糊糊有五个夏威夷衬衫拍着我的背，一边拍一边笑。

分不清空气和水，也分不清陆地和大海。我躲进了豪华轿车里。又干燥又安静。这车是堂里的兄弟们雇来接我的。火奴鲁鲁的兴隆堂里的老兄弟比大陆兴隆堂里的兄弟更加会享乐。这并不是说他们没开低等小酒馆和夜总会，他们同样看着姑娘们在自己的店里跑来跑去。他们在战争中也出了一份力。但西雅图、旧金山和洛杉矶这些城市都有法律管着。在夏威夷，战争就是法律。兴隆堂中的兄弟是快活的士兵，是法官、陪审员兼执法者。

兴隆堂的兄弟们告诉我，他们有时下晚班回家时会打开电视，调到老电影频道，找个电影看看。有时——不太多，一年中有四五次吧，夏威夷的每一个电视台都会播放有我扮演死亡角色的电影。这帮兄弟仍然把我当作大明星。这次我来夏威夷客串《夏威夷州警》的两集。本指望麦格加勒特会派豪华轿车来接我。不过这帮兄弟更乐意到机场接我并陪我到了瓦基基饭店。《夏威夷州警》的公关人员又是拍照，又是写故事，说火奴鲁鲁各堂会中人把火奴鲁鲁警探阿帕那·张和肥胖的陈查理看做是自己童年的美好回忆的创造者，为火奴鲁鲁酒店街上的唐人街在战时带来了不少生意。我的兄弟们为此感到很高兴。在电影中，我是陈查理的第四个儿子，最美国化的儿子。在实际生活中——不管它是什么——我生于中国。南方。唐人。广东人。这一切融合成为一个很好的故事，这个故事正是为我大吹特吹的报纸和电影公关人员所愿意相信的。

我很喜欢。

“我这次来火奴鲁鲁所要扮演的角色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对这帮兄弟说，不过这出戏为我付了路费，使我能够到夏威夷来与兄弟们一聚，也使我能够拜访一下最后一位仍然在世的扮演陈查理的白人演员。”

“你是说此人在岛上？”兄弟们问，“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他似乎只把地址给了我。他不愿抛头露面，”我说，“他想清静。好几个广告公司找到我，想请他再次出山，穿上陈查理的白裤子，戴上陈查理的巴拿马草帽，为他们的产品做几次广告。我要劝他出山赚点钱。”

他们被我的谦虚和忠诚深深打动了。他们想知道我在《夏威夷州警》中演什么角色。这个角色是死还是活？演华人还是日本人？演一个南方艺术家还是北方官僚？有什么区别吗？演斜眼吗？演女人气的男人吗？演秃顶吗？演浓眉男子吗？我们笑声不断，使我们想起了过去的笑声，想起了夏威夷短袖衬衫，想起了老电影，想起了战时的快乐时光。客套过后，这帮兄弟咧着嘴朝我笑，犹如张开嘴的鲛鱼，他们瞪大眼睛，好像刚咽下一口烈酒。在他们晕乎乎的等待的目光中，看得出他们想知道我在《夏威夷州警》中的角色。

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军阀，通过夏威夷往美国走私毒品，与麦格加勒特、秦何、达诺、祖鲁等一帮警察发生了冲突。当然，我死在钻石岬的阴影中。”

他们很喜欢。他们说，《夏威夷州警》把陈查理电影的套路变得更完美了。他们喜欢看到二战电影中的坏蛋又找到了新的活

钻石岬，夏威夷的瓦胡岛东南部的一个海角。

路有如往昔重来。

我说：“它给了我一份工作。我们都笑了起来。

在去饭店的路上我发现《虎虎虎》仍在火奴鲁鲁的一家大影院中上映。“啊对了，是一部和平电影。”我说。

“和平电影？”一位兄弟问道。

“一部和平时期拍的战争片。我记得在战时与约翰·韦恩、范·约翰逊和加里·格兰特一起演过战争片。”

对了，夏威夷的兄弟们记得珍珠港事件后到过夏威夷的这些明星们的名字。战时，这些兄弟开餐馆、开酒吧或开低档小酒馆；他们记得当时我从旧金山或洛杉矶飞过来，扮演丑陋的日本间谍或残忍的日本军曹，临死前尖叫着“啊一噢一噢！”然后来到唐人街吃晚饭，并在脸上抹上夏威夷红色，和陈查理的其他几个儿子及威利和康姆一道出去风光一番，从唐人街到瓦基基，一家夜总会接着一家夜总会地追华人女子和日本女子。城里的大兵和禁区里的大兵认出了我们，朝我们笑，伸出胳膊搂住我们，我们也伸出胳膊搂住他们。他们拍拍我们的头，我们也拍拍他们的头，看着他们踉踉跄跄地走开，进了妓院或回基地。

唉呀！阿罗哈！恭贺！恭喜发财！当时的唐人街和电影都十分热闹。战争胜利后它们更有前途。夜生活亮如白昼。当时的唐人街别具一格。上衣有垫肩。大翻领。双排扣套装。草帽。那也是我的快乐时光。

兄弟们对我说：“夏威夷有人反对晚间电视节目播放陈查理电影、约翰·韦恩的战争片和二战影片。这些人毫无历史感。”

“当年美国人认为所有华人都是性变态、鸦片贩子和折磨妇女的暴徒，年轻一代不知道这些。”我说。

“正是。你、凯、本森和维克多才是更积极的、更真实的华人形

象。”一个兄弟说。

“我们的父亲陈查理也如此。”我说。

是啊 只要你晚上打开电视 调到任何一个播放陈查理的电影或关于二战中的中国的电影，那你便是在看我的生平故事。每天晚上 从火奴鲁鲁、纽约或芝加哥的某个电视塔上 我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便如烟如雾地伸展开来。我仍然喜欢在异地他乡打开电视 消遣一番 让我生活中的美好时光给自己带来惊喜。

五十年来 整整半个世纪 我是美国最出名的华人：一位演员。我是陈查理的四儿子 绰号叫做第四或四弟的华人。是的 我是陈查理在电影里的儿子之中的基督徒 殉道者 人人都知道我只会说“噢 爸爸！”和“天哪 爸爸！”我是必死的中国佬。

在电影和电视中演了五十年锻炼出了一个更好的我，鼎鼎有名，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留下了一连串美好的记忆。我不再是出生于中国南方小村、被送给珠江上的戏班的小学徒了。我出生后 有人见到好莱坞野猫把我拖进一个黑暗的摄影棚。在上海遭空袭后的一个场景中，我光溜溜一丝不挂地在一个被炸毁的火车站中号哭。在另一部电影中 威廉·本迪克斯冒着另一场日军空袭，在一个中国小村的残垣断壁中发现了。我趴在死去的妈妈的干瘪的奶头上 嗓子哭哑了，长嚎不已 最后哭得接不上气来。这部电影名叫《中国》。

在威廉·本迪克斯的怀抱中，我象征着在无依无靠中挣扎的中国。他说我是个“可爱的小家伙” 还管我叫“唐老鸭”。

艾伦·莱德和威廉·本迪克斯把我交给一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妇女 这位由白人扮演的中国妇女把我抱在怀里 看着我 嘴里唔唔地说：“除了恶魔 谁会想伤害这样的孩子呢？”从这个镜头往后，看电影的人都知道我是难逃一死的中国佬。

我喘了口气，接着又是一声长嚎，从一部电影到另一部电影，没完没了，有时出现在遭日军空袭的某地的场景中，有时与凯特·密斯一起，在广播中为美国家庭唱《美丽的美国》。美国人每购买一张战争债券，心中都珍藏着对我的死亡的记忆。

凯特·史密斯长相甜，身上的气味也甜，还有一点点辣，就像刚出炉的大面包卷，飘着好闻的肉桂香。

在一部关于传教士的电影中，加里·库珀和他女友收养了我，他的女友是红十字会的护士。一个牙齿上挂着黏液的日本军曹把长长的武士剑捅进我的身体，我凄厉地长嚎：“妈——！”剑透过我的身体，又刺穿了我妈妈一息尚存的身体，从她的后背伸出了剑尖。镜头对准了我的脸，长剑抽出我们的身体，啧啧有声，长剑发出炫目的光，挡住了我的脸。战争信息办公室里的诗人说，我喊出了跨越语言、跨越时间的一个字：“妈——！”长剑抽出了我的身体，我与中国母亲分开了，像一只大蟑螂一样，重重地跌落在日本军曹的脚下。瞧这组三人相，这便是战争片作为感情武器的富于诗意的形式：1. 流血死去的中国母亲；2. 流血死去的中国儿子；3. 歪着眼睛看人的恶毒的日本人揩去刀刃上的血。

日本人折磨我，逼我说出了约翰·韦恩的藏身地。他们把我扔进卡车，在凹凸不平的路上把身受重伤的我颠得半死。约翰·韦恩正领着我的传教士老师和菲律宾游击队战友穿越丛林，日本人想抢在约翰·韦恩的前头。我夺过汽车的方向盘。日本兵尖叫起来。我忍着眼泪呻吟着，把卡车开到路边，与日本兵一起栽进了黑暗中。

我滚出着火的卡车，滚到约翰·韦恩和我的战友们的脚下，他们当时正与安东尼·奎因一起在丛林中悄然而行，看到我滚下来，大吃一惊。满载着烧成一团的日本兵的卡车熊熊燃烧，借着它发

出的光亮，美国看到了我的脸。他们看到我强忍着痛，没有叫出声。我泪流满面。

“别说话，”约翰·韦恩轻轻地说。安东尼·奎因转过脸，抽泣起来，把子弹装进了冲锋枪。约翰·韦恩和那位传教士老师——她从教会我如何拼写美国，我总是写成“米国”——交换个眼色，摇摇头。所有战友都围着我，跪在我身旁。乐声高扬。

“我没有完成任务，”我气喘吁吁地说。“估计不会提拔我当中士了。”我的眼球缩回头颅，喘息尖细，犹如撕绵裂帛。好像有人在铁桥上拿着一把长锉锉钢梁。我咳嗽起来，嘴角渗出半品脱血块。在银幕上的背景中，日本兵被烧得滋滋响，像香肠似的劈劈啪啪地炸开了。借着日本兵燃烧发出的光，穿着逛商店的便服、带着大纸带和购肉券的妇女们看到了约翰·韦恩的眼泪。他把衣领上的上校领章摘下来别在我的衣领上。

“你完成任务了，”约翰·韦恩说。他垂下眼帘，哽咽了一下，接着说：“嗨，你被提拔了！”他把领章在我的血淋淋的衬衫上整理好，低声轻轻地说：“我接到总统亲自颁发的命令，把你直接提拔为上校！”

我睁开眼睛，艰难地喘息着。乐声扬起，恰到好处。

“老师？”我无力地说，“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

从印第安那州来的传教士老师不得不把耳朵贴在我的嘴边，听我最后的遗言。

“哎呀！”我说道，“嗯——！”我双目圆睁，闪闪发亮，似中了魔。传教士老师擦去我嘴唇上和眼角的血迹，慢慢地整理着我的头发，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块块血痂和外露的伤口。我继续说：“呀——！”

“放松些，勇士。”约翰·韦恩安慰道。他猛地耸耸肩，扭头向身后燃烧的卡车看去。

“呃！呃！”我哑着嗓子叫起来。我的胸膛起伏不止，像一只交媾中的狗的脊背。“眼！看！啊——！”我胜利高呼，挣扎着用胳膊撑起身体。“米国！”

传教士老师尖叫起来。

约翰·韦恩说：“别紧张，上校。”镜头里的约翰·韦恩叹着气，皱着眉，我倒在他的怀里，死了。

约翰·韦恩转向那位印第安那州传道士老师说：“你没教会他如何拼写美国，我该把你崩了。”

“停！”导演大声喊着，让我说“美国”，不是“米国”。我想用法语对他说一声圣诞快乐，但我忍住了。

夏威夷分堂里的兄弟们喜欢我给他们讲如何拍摄他们看过的电影的故事。

他们想知道我是否演过飞行员。我在电影里开过飞机吗？

我告诉这帮兄弟，有一次那伙人认为让我扮演与我的角色类型相反的人物很有意思，我演了一个疯狂奸诈的日本飞行员。

老兄弟们想听听这个故事。华人在好莱坞电影中演飞行员是很少有的。

一天，我驾驶着零式战斗机，在浓雾中低空飞行在海面上。我发现加里·格兰特的美国潜艇“铜翼号”正驶向东京。我向潜艇投了一颗炸弹，但没爆炸。我掉转机头，用机关枪朝潜艇猛扫，在指挥塔上留下一串弹痕，撂倒了小艾伦·黑尔。

约翰·加菲尔德从潜艇上用机枪击落了我的飞机。飞机拖着浓烟，一路怪叫，在远处坠毁了。特写镜头中的美国佬一片欢呼，惊奇不已。他们在爆炸的强光中眨着眼睛，爆炸的冲击波把我冲到加里·格兰特的潜艇旁。一位水兵从潜艇上跳下海，把我拉进潜艇。我眼光一闪，龇着牙，拔出匕首捅进了这个美国水兵的后背。

瘦骨嶙峋、双唇饱满的药剂师助手来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顿顿有熏肉加鸡蛋的爱荷华州。他将在拆除我丢下的那颗炸弹并将在潜艇作深水攻击时用一把剔骨刀和削土豆刀在餐桌

为胆战心惊的小埃利沙·库克做阑尾切除手术。这个爱荷华小伙子刚出道，显然没见过像我这样残忍、无礼、恩将仇报的人，竟然在救命恩人的背后捅刀子。“欢迎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孩子。”在他的第一颗子弹打中我时，我冲着这个呆若木鸡的小伙子尖叫：“啊！土咦！土咦！”曾在小村的残垣断壁中发现我的那个威廉·本迪克斯，眼看着这个瘦骨嶙峋的少年用机关枪把我扫射成肉泥漂在海上。电影发行后，我即兴说的几句话成了咕咕哝哝的胡言乱语。因为尝过了真正的仇恨并为杀人感到欣快，那个少年所受的基督教的不可杀生戒律的教育沾上了弗洛伊德的阴影。

加里·格兰特艇长拍拍少年的后背，点着了烟斗，说道：“孩子，你杀了个日本人，没杀人。”

少年年纪很轻，没刮过脸，没被吻过，没与女人睡过觉，还分不清公母。他的下嘴唇像拉娜·特纳的嘴唇一样丰润。他茫然不解。机器在小潜艇的肚子里闷响。潜艇的内壁像流汗似的凝着水珠。加里·格兰特的脸上亮晶晶的，但没有流汗。

加里·格兰特边抽烟斗边思考，然后把烟斗从嘴里拿下，说：“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关系到体面能否在这个世界上持续下去。这是场善恶之间的战争。”艇长抽着烟斗，沉思着。

少年咽了口唾沫，喉节隆起，眼睛眨个不停。艾伦·黑尔在围裙上擦擦手，伸头进来听。

“我理解那个孩子。”本森在他的波利尼西亚风味餐馆的办公室里，一边看着电视上放的黑白片《目标东京》，一边说道。他在洛

杉矶有好几家餐馆。“我真希望年轻时自己就是这个小伙子。”他说话时有点迟疑不决，但不带他平常说话时的结巴。他结巴时表情显得很慢，好像言不由衷，但这次说话并不是这样。“我本可以参加兄弟会。参加兄弟会的聚会，与姊妹会的女孩跳舞。”

一位军官双手撑在桌子上，弯腰凑近加里·格兰特。画面有点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正从水底靠近东京。加里·格兰特深深叹了口气，说道：“真搞不懂，日本人在女儿十三四岁时就卖给人当妻——甚至更糟。”他摇摇头，口气坚定起来：“日本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对女性的那种爱。”

双目透着精明的风信子教育我说，在珍珠港事件把日本佬和中国佬区分开来之前，赛珍珠早就把皈依基督的“华裔美国人”与“邪恶的华人”“中国佬”区分了开来。

我当时还年轻。我皈依了基督，被战争大潮搁浅在美国的其他伶人没有皈依。我太年轻了，只是个小学徒而已。我不该来美国。我并不真的是粤剧明星。我有个妹妹生在美国，是美国公民，帮了我的忙。真正的粤剧明星是王俊美和大关，他们嗓子好，在美国一直呆到战争结束，在各个城市的唐人街之间巡回演出，受过骗，遭过抢，在萨克拉门托三角洲一带拍中国电影。现在，似乎没人听说过他们，我倒成了战前来美国的惟一的粤剧大明星。

与陈查理的其他儿子不同，我经历过陈查理的那种生活。我从粤剧和中国电影中跨越到好莱坞。我皈依了基督教。我已经美国化了。我的耳朵和嗓音受过粤剧的训练，比凯·卢克的僵硬低沉的嗓音更适合说甜言蜜语。我可以扮演任何人物、任何年龄的角色，从裹尿片的婴儿到上百岁的麻风病人，这一点我又比绷着脸、说话结巴、上气不接下气的本森·方强。在拍上海火车站被炸的那个镜头时，他们把我塞进一件肉色衣服里，又造了一个特大号的道

具，使我看上去就像个光肚皮婴儿。我比在美国出生的维克多·森·杨还要美国化。

对我的妻子风信子来说，嫁给必死的中国佬并不够理想。她出生于美国，是第四代美国华人，但她比我更像老广东。对粤剧比我还要认真。她的妈妈也是美国出生，但一辈子只会说中国话。她说的广东方言十分古老，我从未听人说过。老太婆与女儿想法一致。她对自己的外孙在成长过程中一直看我在电影里被打死感到很不满意。她问：“你为儿子作了什么榜样啊？”

“我也是这么问他的妈。”风信子说。

“为了我们的儿子，”我对她说，“我保证是电影里演陈查理的第一位华人。”

“陈查理？”风信子和她的妈妈异口同声地问。

“你们不是基督徒，不过，你瞧，我照样爱你们。作为陈查理，我们领着你们，使你们得到拯救。书中是这样写的：圣父以完美的白种男人的形象献出了自己的儿子，让他领着白人走上了通向救赎的正途。感谢上帝，于是白人又以完美的华裔美国人的形象献出了一个儿子，让他带领黄种人建筑通向接纳和同化的大路。啊，多美妙的同化。他的名字叫陈查理。”

“当然是陈查理。没有陈查理，我们这些人又会在哪里呢？”众兄弟齐声应和，我们放声大笑，就像一个明星独坐在豪华车里做梦一般。在如梦如幻、又安静又舒适的豪华轿车里，我和这五位兄弟感到既清静又融洽，我们笑得像傻瓜似的。电影明星的感觉又回来了，真好。

“你演过那部叫《中国》的电影，在电影里，维克多·森·杨的大背头比艾伦·莱德的镜头还抢眼。”一位兄弟想起了这部电影。

“维克多·森·杨是三儿子，是银幕上最伟大的华裔美国人演

员。’我说道“，在陈查理的儿子中 他第一个进好莱坞，演了一辈子。我仍然在找他演的几部老片子。他在威廉·韦勒导演的《信》中有几个镜头，这部片子由贝特·戴维斯主演，维克多演一名大名鼎鼎的传教士 与艾伦·莱德和洛雷塔·杨一同坐在卡车里。我想看看他那油光光的大背头与大明星抢镜头的那一段。”

堂里的众兄弟为我摆下了盛宴 请来了《夏威夷州警》中的明星和剧组人员。对麦格加勒特来说，一切都很有分寸。他是个善良正直的基督徒。看不到有人喝酒。没人吸烟。没有粗话。没有荤笑话。致辞一个接着一个。众兄弟热情奔放。麦格加勒特穿着他在《夏威夷州警》中穿的蓝套装 十分严肃 庄重得体 富于魅力 不动声色 很有节制 酷呆了。他们找我。他们要找四儿子。我便拿出陈查理四儿子的样子。

“噢，爸爸，各位兄弟，各位朋友，《夏威夷州警》 大家好。我说，哎哟，爸爸，以爸爸陈查理的名义，以儿子凯·卢克的名义，以厄尔·德尔·比格斯 的名义，以圣灵的名义。作为美国人，与说相同语言的伙计们聊天，感觉好极了。”

每张桌子上有一只乳猪，一只茶叶熏鹅，各色鱼肉。因为我们是广东人，必须吃米饭，所以九道主菜中有一道香米。

“今晚我感觉极好。时辰绝佳。生物节奏特棒。我觉得今天是个好日子。一切都会很顺利。这肯定是受夏威夷气氛的感染！”连麦格加勒特也微笑着鼓掌。众兄弟大笑，大家用胳膊肘你捣我，我捣你。

“此时此刻，请让我这么说，对我们来说，陈查理便是我们华人

厄尔·德尔·比格斯 美国作家 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写了一系列以华裔警探陈查理为主角的小说，这些小说后来被改编为电影。

的《新约》福音。华纳·奥兰德、悉尼·托勒、罗兰德·温特斯和安劳夫·洛伦 便是陈查理预言家。”

“在陈查理的儿子中 我惟一有幸见过厄尔·德尔·比格斯。他是我们的圣灵 我们的创造者。我就是在火奴鲁鲁、在夏威夷皇家饭店的酒吧里见到他的。当时他正在写一部新的陈查理小说，《陈查理在温尼马卡》。当时我与本森正好从大陆过来，在加里·库珀的传教电影中演一个必死的角色。本森不死，我死。我与比格斯先生说笑，谈起了教当地的华人孩子用广东话唱《我的肯塔基老家》，教他们扮演中国教会学校的孩子，迎接加里·库珀到中国传教。”

“比格斯先生没有和我一起笑。他反倒变得很严肃。他说，在陈查理的所有儿子中 我独具悲剧感。他说 因为这一点 我无疑是陈查理的儿子中最美国化的一个，当时他认为我很可能是在银幕上扮演陈查理的第一位华人。他对我的演技很了解，我很吃惊。他说 我所扮演的角色创造出了一个新人物 作为人类堕落的牺牲品的美国华人 作为受害者的美国华人 作为疾病的美国华人身份危机。”

“厄尔·德尔·比格斯从我的身上看到了这一切。他对我说 这才是能卖座的美国华人。为了写他的下一本书《陈查理在温尼马卡》 他对我作了专门研究。在这本书及同名电影中 你们会看到陈查理在里诺赌场的厨房里遇到了一位来自爸爸的堂里的姓陈的洗碗工。我说到这里 桌子旁的众人微笑着点头 表示认可。

“在《陈查理在温尼马卡》中 安劳夫·洛伦第一次出演陈查理。我再次出演陈查理的光荣的四儿子。安劳夫·洛伦身高六英尺四，

这四个人都是美国演员，先后在陈查理电影系列中扮演华人警探陈查理。

是比利时人的后代，年长我五岁。他是第四位扮演陈查理的白人。在弗兰克·卡普拉的《任将军的苦茶》中他扮演任将军，引诱巴巴拉·斯坦维克。他因此差点成了好莱坞大明星。”

“安劳夫告诉我，卡普拉让他剪短了睫毛，因为他相信，短睫毛是使白人的眼睛看起来像东方人的眼睛的秘密所在。他告诉我，在眼睫毛长好之前，他不得不一直戴着遮阳帽和墨镜。”

“我告诉他，在广东话里‘四’字念‘say’，‘死’字也念‘say’。‘是啊！(say yeah)在英语里是表示完全赞同的，而在广东话里的意思却是‘死呀！’是骂人话。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在书和同名电影中，特别是在电影中，爸爸可怜那位姓陈的洗碗工，他从出世起就一直那副华人样，一点也没变，虽然是旧金山和温尼马卡唐人街堂会中的大佬，但在现实中仍然只是个洗碗的。在现实中，这个洗碗工竟然看不起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裤子的火奴鲁鲁警探陈查理。爸爸长叹一声，问为什么？为什么他竟被华人洗碗工看不起？爸爸说，那是因为谦恭有礼的侦探走的不是旧中国的蛮夷老路，而是走上了进步之路，变成了基督徒，变得美国化了。”

气氛沉重了起来。席间听不到吃饭的声音。他们被打动了。他们在倾听我讲述。

我说：“我的二儿子叫尤利西斯，风信子偏要为儿子取这本禁书的名字，他长到十岁也没看到我在其中演过死亡角色的二战片。他最早看到的电影是下雨天在文法学校看的。下雨天，学校不让孩子们在午餐时跑到室外被淋个精湿，于是便在礼堂里放电影。他十岁时我才给家里买了台电视机，一天夜里他看到了《陈查理在温尼马卡》。那么晚了，谁也没想到他还在一个人看电视。”

他们鼓起掌来，似乎我要讲的已经结束了。我笑嘻嘻地就此